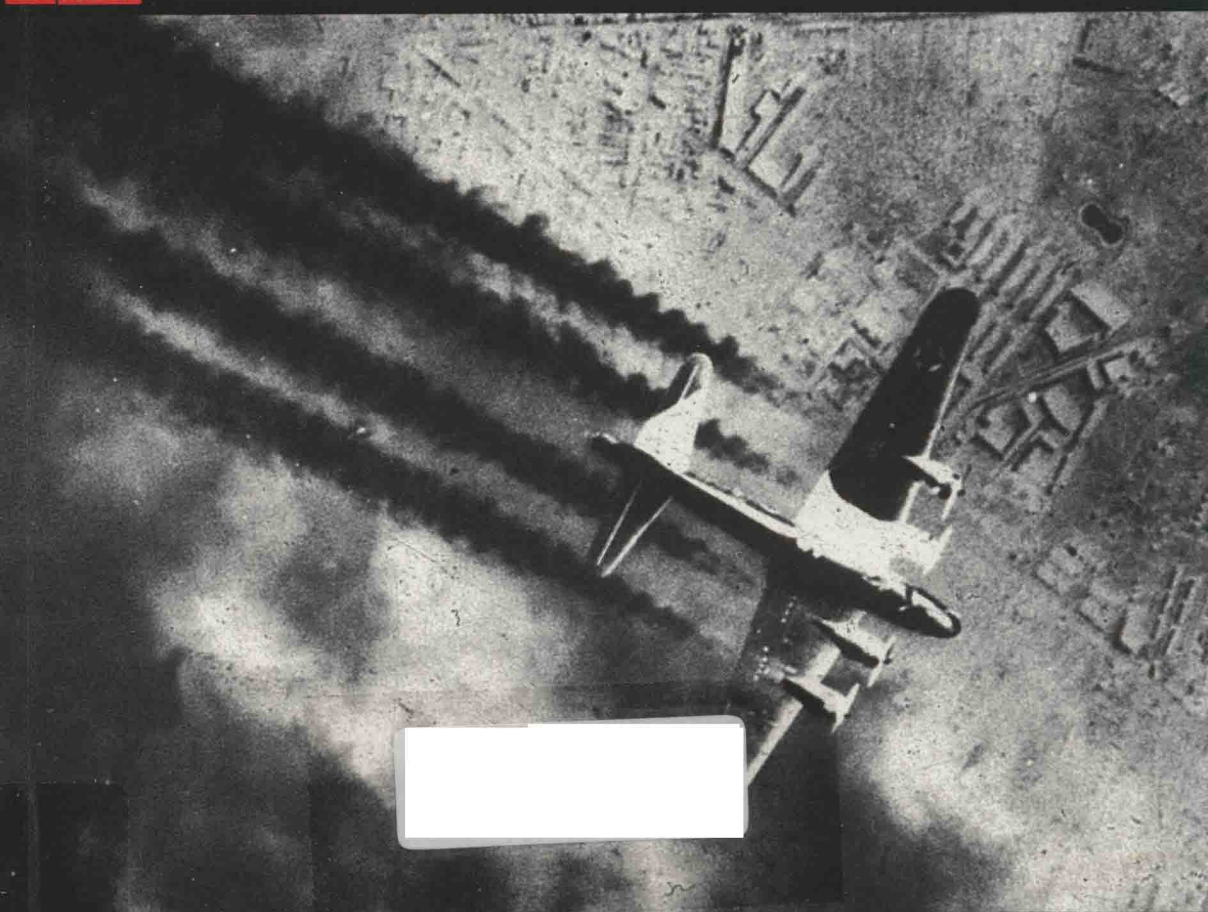


为失败而战

著译
约翰·布萊登
沈刻亦
耳觉

FIGHTING TO LOSE

纳粹情报机关如何帮助盟军取得胜利



英国情报机关从上到下完全被德国人渗透了，但英国却因此而得救

德军空袭英国竟然是丘吉尔一手策划

日军偷袭珍珠港竟然是罗斯福诱导所致

这一切——都和纳粹情报机关阿勃韦尔及其首脑卡纳里斯上将密切相关

基于大量第一手材料真实再现一场你无法想象的二战

不了解阿勃韦尔，就无法理解整个二战

为失败而战

著
译
约翰·
布萊登
沈耳
刘亦觉

FIGHTING TO LO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为失败而战 / (加)约翰·布莱登著;沈耳,刘亦觉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8

书名原文: Fighting to Lose

ISBN 978-7-308-15988-3

I. ①为… II. ①约… ②沈… ③刘…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料 IV. ①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41651号

Copyright©John Bryden,2014

Fighting to:How the German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Helped the Allies Win the Second World War by John Bryden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Dundurn Press Limited,Canada.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ZHE JIANG UNIVERSITY PRESS in arrangement with Dundurn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为失败而战

[加拿大] 约翰·布莱登 / 著 沈 耳 刘亦觉 / 译

责任编辑 谢 焕

责任校对 杨利军 田程雨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312千

版 印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5988-3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目录

引言 1

序幕：腐败？无能？愚蠢？ / 5

PART 1

1 一位间谍头目的奇事 / 31

2 希特勒的内部敌人 / 42

PART 2

3 那个“愚蠢的小个子男人” / 65

4 也许有点儿太容易了？ / 81

5 阿勃韦尔布下罗网 / 96

6 卡纳里斯背叛了自己的事业 / 108

7 E-186：内部的间谍 / 128

8 姓名付之一炬 / 142

9 伯明翰在燃烧 / 156

10 CELERY中了头彩 / 173

11 孟席斯想知道 / 188

PART 3

12 红日升起 / 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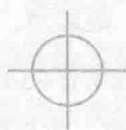
13 问题清单去向何方 / 234

14 周日前的平静 / 248

15 虎! 虎! 虎!	/ 264
16 珍珠港补遗	/ 284
17 重访最后时刻	/ 299

PART 4

18 终极秘密	/ 319
19 尾声：耍赖的毫耄老人	/ 345



引言

在英国记者伊恩·科尔文（Ian Colvin）所著的《情报头目》（*Chief of Intelligence*）一书中，作者写道，二战结束几年以后，他在和一位来自某个政府部门的高级官员吃午餐时，于谈话间问及对方如何看待英国情报人员在战时的表现。那人带着某种强调的语气说：“嗯，我们的情报人员准备得不赖。你知道的，我们有海军上将卡纳里斯（Admiral Canaris），这可是相当重要的。”

但科尔文对此并不知情。由于科尔文战前一直在柏林，并且向英国国内发回过很多关于反希特勒人士活动的有价值的情报，这位官员便错误地认为，科尔文本人就是一名英国情报部门的特工。其实并非如此。

这位官员的话到此为止，但这段小插曲却让科尔文开始了进一步的探寻。通过他自身的经历，他知道战时德国秘密军事情报部门阿勃韦尔（Abwehr）的负责人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曾经开展过反对希特勒的工作。但他真的是英国间谍吗？

“那天我吃完午饭离开的时候便意识到，这一定是这场战争中保守得最好的秘密了。”可自那之后，他却四处碰壁，除了有一位战时陆军

部的老人曾提到过一句：“嗯，是的，他尽其所能地帮助我们。”但他也没再透露更多。

科尔文没法接触到秘密档案，特别是外交部和陆军部的档案，军情五处（MI5，英国安全局）和六处（MI6，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就更甭提了。但有些接近卡纳里斯的官员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于是他去德国找他们进行了交谈。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小部分自己关于卡纳里斯的故事，科尔文则把这些回忆拼接到了一起。很显然，卡纳里斯的确向英国人泄露了1938年希特勒针对捷克斯洛伐克所作的军事部署，也的确挫败了希特勒1940年把西班牙拉进战争的企图。他也曾事先将德国1941年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Operation Barbarossa）告知了英国人，还参与了两次刺杀希特勒的密谋。

科尔文的结论是，将卡纳里斯描述成“英国特工”有点儿太过了，但从他所掌握的情况来看，“他在情报领域的疏忽让盟军获得了意外惊喜，并且幸运地使他们更加接近最终的胜利”^①。他还发现，卡纳里斯在反希特勒的密谋中只是被动的参与者，并没有扮演主要角色。科尔文不得不依靠道听途说来进行工作。因此，之后的几十年里，关于卡纳里斯的争论反反复复地上演着：有些作者将卡纳里斯塑造成德国反纳粹阵营中一位不为人知的英雄，而另一些作者——主要是英国人——则将他描述成一个腐败低效的情报机构中的无能领导者。到70年代末期，后一个观点胜出了。

但是，90年代之后，英美两国公布的相关档案，再加上一直以来都能够查阅到的缴获的德国方面的记录都表明，卡纳里斯是德军反希特勒密谋中的核心人物。更了不起的是，他所领导下的阿勃韦尔在德国的敌人一边，对战争中的某些事件做出了决定性的干预，最著名的便是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和1944年的诺曼底战役。

这远远超出了科尔文和大多数卡纳里斯同代人的想象。

新开放的军情五处文件很不完整。它们受到了严格的审查并被“除

① Ian Colvin, *Chief of Intelligence*, New York: Victor Gollancz, 1951, 218–2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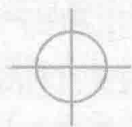
过草”——既有名正言顺的也有偷偷摸摸的。这样做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以至于英国的安全和情报部门自己都无法对它们战时的往事有太多了解。尽管如此，通过将新公布的材料与国外保存的相应情报文件以及幸存下来的阿勃韦尔的记录加以比对，至少有部分信息还是可以得到恢复的。

美国方面的情况要好一些，因为相关的档案属于联邦调查局（FBI）和战略情报局（OSS）——中央情报局（CIA）在战时的前身。能够查阅的文件数量巨大，这得归功于美国人不遗余力地试图搞清德国秘密情报部门是如何运作的，这既包括军队方面也包括纳粹党方面。有不少联邦调查局与战略情报局的文件都能对英国方面的材料形成补充，在大西洋一侧明显缺失的内容有时可以在另一侧被找到。

但一直以来无法获得的，是两国都未予公开的那些将战时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与各自情报部门直接联系起来的记录。尽管战略情报局和军情六处的两位负责人几乎每天都要进行汇报，但是，没有任何关于罗斯福和威廉·多诺万（William Donovan），或丘吉尔和斯图尔特·孟席斯（Stewart Menzies）之间的会议记录或通信可以被查阅到。无论如何，如果不把秘密情报对战时四位主要领导人（丘吉尔、罗斯福、希特勒和斯大林）决策的影响考虑在内的话，二战是无法被充分理解的。

本书正是致力于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这通常意味着对不完整的证据进行考量，由推测而得出结论而非严格证实。这也意味着在一开始就要假设英国、美国和德国的秘密情报部门有时会对手头的记录进行操纵以达到自身的目的。

下面要展现的便是看待二战的新视角。



序幕

腐败？无能？愚蠢？

联邦调查局并不喜欢这个主意，可又能如何呢？最高权力就是最高权力。如果正准备进军欧洲的盟军总司令麾下的情报负责人决定让英国人首先审讯被俘的德国间谍和间谍头目，那也只能如此了。

联邦调查局内部的备忘录对此大感惋惜：“G-2（部队中代指军事情报负责人的术语）已经同意英国人将优先占有俘虏和记录材料，了解了这个情况就会发现，英国人将处于一个有利位置，只向我们美国人提供他们想让我们看到的资料。”

时值 1944 年 1 月初。二战已经进行到第五个年头。尽管纳粹德国的军队还占领着欧洲大部分，但他们就快要在集结于英格兰南部、以美军为主的军事机器和东线苏联巨人的夹攻之下被彻底击溃。除非德国的秘密武器技术出现奇迹，否则战争的结束已指日可待。

“从我方在南美的经验和……源自‘鸵鸟’^①的消息来看，我们发

^① “鸵鸟”（Ostrich）：美国人对代号为“Ultra”（超级机密）的秘密计划中所获情报的称呼。“Ultra”是英国情报部门于 1941 年设立的顶级秘密计划，旨在截获和破解纳粹向欧洲和南美的地下网络传递信息的通信密码。后成为盟军方面的主要协同情报机构，为盟军取得二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译者注。

现英国人在不断抵制和拒绝向我方提供我方本应正常享有的所有相关信息，”这份给联邦调查局各部门负责人的备忘录继续写道，“英国人想要占据一个有利位置，以便把我们挤出西半球的情报领域；如果他们与 G-2 方面照此携手的话，其结果也许是 FBI 将被挤出美国的情报领域……”

两年针对共同敌人的协同合作却使得联邦调查局与英国情报部门——军情五处与六处——之间，相互产生了深深的不信任感。

英美联盟此时正处于为渡过英吉利海峡进军德国占领的法国领土进行准备的最后阶段。盟军远征部队最高司令部（SHAEF）——在美国将军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日后的美国总统）领导下的指挥机构——负责指挥集结于英格兰的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军队；如果登陆成功的话，盟军希望能抓到尽可能多的俘虏，包括德国秘密情报机构的人员。最高司令部的 G-2，英国准将肯尼思·斯特朗（Kenneth Strong）预见到了这种情况，他要求联邦调查局提供一份作战部队需要仔细寻找的人员名单。遗憾的是，从联邦调查局的角度来看，斯特朗也同意这些战俘应该首先交给英国人来审讯。

“存在这种可能性，”联邦调查局的备忘录继续写道，“即也许是英国人促使 G-2 提出的这份请求，这可能是英国方面为了在情报领域尽可能地获得全面控制而走的另一步棋。如果这纯粹是来自 G-2 方面的请求，至少可以说，这个举措是幼稚的……”^①

这种不满情绪有点儿像孩子对父母的叛逆感。英国的两个秘密情报部门——军情六处与军情五处——倾向于认为，美国联邦调查局所掌握的一切有价值的反间谍措施全都是从他们那儿学来的，但它却不是个好学生。遗憾的是，这两个英国情报机构的官员们批评得有些太过随意了，联邦调查局已经迎头赶上。

^① Cunningham to Ladd, *Memorandum*, 27 Jan. 1944, NARA, RG65, IWG Box 126, Doc. 65-37193-144. 斯特朗是英国情报机构的老成员，之前曾是战争部军情十四处（MI14）的负责人。军情十四处是负责对德问题的军事情报部门。不应把他与华盛顿 G-2 的乔治·V. 斯特朗（George V. Strong）将军相混淆。

实际情况是，军情五处和六处从一战时就进入了这个领域，“军情”（MI）代表着“军事情报”（military intelligence），尽管两者后来都演变成了实质上的文职机构。军情六处负责收集国外的秘密情报，而军情五处则处理国内的反间谍和反颠覆事务。

联邦调查局本质上是个警方调查机构，但到了1939年二战爆发时，它突然发现自己不得不对美国领土内的德国间谍问题。随后，它与英国人开展了非正式的合作，将这种相当愉快的关系一直保持到1941年年底日军突袭珍珠港导致美国参战为止。在那以后，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双方的关系就不是那么和谐了。战争开始时，美国方面花在技术上的资金太多，而且他们似乎对拘捕也过于狂热。与此同时，英国方面的心机重重也毫无必要，而且他们一点也不像他们自认为的那么灵光。到1944年底的时候，两边都已经相当厌恶对方了。

英国人很快就对斯特朗将军的慷慨之举做出了回应。当年2月，他们向盟军最高司令部提议设立一个特别的联合机构，其主要职责是识别和审讯被俘的德国情报人员。这个名叫CI指挥中心（Counter-Intelligence War Room，反情报指挥中心）的机构于1945年3月正式诞生。组成其指导委员会的英方代表来自军情五处和六处，主席是英国人T.A. 罗伯逊中校（T.A. Robertson，“TAR”），他是军情五处的一位官员，一直直接负责英国的双重间谍计划。美方的代表则来自于美国陆军的G-2以及X-2，后者是1942年依总统令创建的战略情报局（以OSS的缩写著称的美国海外间谍机构）中的反情报部门。^①

怕什么就来什么。联邦调查局被这个新委员会排除在外，却没有抗议的依据，因为其战时权限被限制在了西半球。尽管他们在伦敦一直有个欧洲工作组（European Desk），但欧洲的反情报战争并不在他们的正式管辖范围内。不过，在非正式层面上，FBI一直试图与军情五处和六处保持亲密的关系，在有关追踪和抓捕活动于南北美洲的德国特工的问题上更是如此。

^① Minutes of meeting re CI [Counter-Intelligence] -War Room planning, Feb. 1945; Note on meeting with Lt.-Col. Robertson, 12-25 Jul. 1945: PRO, FO1020/1281.

但这也无济于事。盟军最高司令部完全是照章办事。这就意味着，进入委员会的是经验不足的战略情报局，而不是老练的联邦调查局。FBI所能做的最大努力就是说服斯特朗将军发布指示，在审讯 FBI 提供的名单上的相关人员时告知 FBI，以便他们可以对审讯所提的问题给出建议，以及收到一份提审报告的复本。联邦调查局局长 J. 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还亲自写了一封信，里面列出了他所关心的问题的提要。^①

一份出自这一时期的胡佛办公室的内部备忘录（被标记为不可向其盟军反情报机构出示）有助于我们了解联邦调查局的兴趣所在。它列出了当盟军迫使德军后退时 FBI 人员要在欧洲着重调查的内容。处于最高优先级的是敌方间谍及其主管人员，并附了一份名单。其次是一切“密码设备”（cipher paraphernalia），例如计算尺（slide rules）、密码栏（grille）、机械器具、说明手册和密码簿等。最后是留意所有挂锁、密码锁、外国制锁和行李锁方面的新进展，特别强调的是对“种种新增的预防主人离开时锁被撬开的专门措施”的关注。^②

反情报指挥中心的运行机制非常简单。基于一份由军情五处编纂，FBI、G-2 和 OSS 都有所贡献的总名单，在欧洲的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军队单位会对战俘和可疑的平民进行排查，以搜寻相关人士。被甄别出来的人员将首先在区域性中心接受审讯，如果被认为足够重要的话，便会被移交给位于英格兰的 020 营（Camp 020）进行更加严格的审问。

020 营位于拉契米尔庄园（Latchmere House），这是伦敦南部里士满（Richmond）附近一座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宅，一战期间曾经是一座医院，为了二战而被改建为一座高安全标准的监狱。在当时，大多数英国抓获的间谍都是在此被审讯的。

020 营有个更为正式的名称：全军种联合详细审讯中心（Combined Services Detailed Interrogation Centre），简称 CSDIC。这个名字将该中心的目标表达得很清楚。在这里，有嫌疑的敌方间谍受到全方位的审问，

^① Ayer to FBI Director, 4 Nov. 1944, NARA, RG65, IWG Box 177, 65-54077(1); Hoover to Ayer, 2 Jun. 1945, NARA, RG65, IWG Box 126, f.37193(11).

^② FBI Director to Ayer, 6 Dec. 1944, NARA, RG65, IWG Box 126, f.37193 (11).

隐藏的麦克风监听着囚犯间的对话，长期的单独监禁被用来软化他们的决心。尽管没有使用肉体上的刑讯折磨，但这却是个不受任何限制约束的机构，其唯一的目的是从那些被下令严守机密的敌人口里将消息刺探出来。

在欧洲战斗的美国部队均遵照指令行事。在从法国到德国的战斗中，被抓获的、盟军感兴趣的德国情报人员会在战地受到简单的审讯，然后被转交给 020 营，并附上一份预审报告。一个很明显的意料之外的问题就是潜在的犯人数量。德军的秘密情报部门阿勃韦尔，以及纳粹党的安全部门——帝国安全总部（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 RSHA）的总部都设在柏林，它们在德国以及所占领国家的主要城市都有下属的分部，在西班牙、葡萄牙和瑞士等中立国的首都也有分部。当时一份英方文件的计算结果是，仅阿勃韦尔的战时雇员就达到约两万人。^①如果再加上帝国安全总部下面外国情报和反情报机构的人员，总数要达到两万五千人。

这就导致要被审讯的人员数量过多，尤其是在 1945 年 5 月初德国投降之后。尽管手头有军情五处提供的名单，但盟军的反情报官员仍然不得不对每一个被发现与德国警察或情报机构有染的人进行审讯。“你们是否认识这个或那个人？认识多久？最后一次看见他是什么时候？他的上司是谁？”这些都是对那些曾为阿勃韦尔和帝国安全总部服务过的秘书和司机、小官员和骗吃骗喝的家伙们所提的问题。每条被捉住的大鱼背后都有无数条小鱼被盟军一网打尽。

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 020 营人满为患，此外，将囚犯移到英格兰也不是件容易事。1945 年 9 月，军情五处在德国的温泉小镇巴特嫩多夫（Bad Nenndorf）建立了一个附属审讯中心——西欧地区全军种联合详细审讯中心，也称 CSDIC（WEA），WEA 是 Western Europe Area 的缩写。美国人在法兰克福附近的上乌瑟尔（Oberursel）也建立了类似的中心。

① 这个数字出自“Bibliography of the GIS”，17 Dec. 1945, PRO, KV3/8。弗朗茨·佐伊拜特（Franz Seubert）1941 年曾任阿勃韦尔柏林总部陆军司二处（Referat 2 of IH West）的负责人，他对美国审讯官说，阿勃韦尔中央索引中登记在册的线人和间谍的数量有“数千人”。Cimperman to Director, 29 Jan. 1944, with attached interrogation, NARA, RG65, (230/86/11/07), Box 35, File 100-274818.



为失败而战

囚犯不断涌入，报告层出不穷。受过审讯的德国安全和情报人员总共有多少，不得而知。到 1946 年底为止，CSDIC（WEA）一个机构经手的犯人就多于 350 人。另外的好几百人则在伦敦的 020 营及其附属机构受审。美国人单方面经手的也不会少于这个数目。^①

1999 年的时候，作为正在进行中的项目的一部分，军情五处将其大量战时文档转移到公共档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即英国的国家档案馆），使得这些审讯报告得以公开。在那以前，这些报告通常只是偶然，或是故意被泄露给历史学家。在美国，相似的（有时甚至是相同的）文件于 1998 年后随着《纳粹战时罪行披露法案》（*Nazi Wartime Crimes Disclosure Act*）的通过而被予以公开。该法案要求将与大屠杀有关的 OSS、CIA、FBI 以及陆军的 G-2 文件公之于众。至于哪些档案应予公开，英美两国的责任当局都采取了相当自由派的观点，其结果是人们有可能借此对盟军和德国之间的秘密情报战产生更加深刻的了解。

联邦调查局认为盟军最高司令部的 G-2 给了英国情报机构太多的机会，这种担心被证实是很有根据的。反情报指挥中心被当成了某种审讯报告交易所，盟军的每一个情报机构都会把自己收集的材料拿出来交换别人手里的材料。从理论上讲，这意味着所有情报交换的参与者都能够同等地建立起关于德方的间谍和反间谍工作的综合图景。但情况并非如此。在 1945 年 2 月召开的成立会议上，英国的提法得到了各方同意，即各国情报机构都可以“对它们各自的情报来源保有最终的控制权”^②。换句话说，美国人和英国人都可以选择是否要将掌握的信息或报告攥在自己手里拒不公开。因为英国人对提审哪些人有优先选择权，并且是他们最先接收缴获的阿勃韦尔记录，所以美国人（G-2、OSS，以及间接的来说，FBI）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他们对德国秘密情报机构阿勃韦尔和帝国安全总部的了解很有可能被紧紧限制在

① 关于建立这些审讯中心的过程和细节，包括位于比利时迪斯特（Diest）的战术审讯单位在内，参见 R.W.G. Stephens, *Camp 020: MI5 and the Nazi Spies*, London: Public Record Office, 2000, 71, 82, 113.

② Minutes of meeting of CI-War Room, Feb. 1945, PRO, FO1020/1281.

了英国人所允许的程度。

无论如何，对德国情报工作做出评估是很有挑战性的。阿勃韦尔的负责人威廉·卡纳里斯（Wilhelm Canaris）海军上将已经过世——他于1935年接手阿勃韦尔，在希特勒手下将其壮大，并一直领导到1944年初。据推测，他在被纳粹逮捕后死于盟军的空袭行动，这是帝国安全总部的前负责人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Ernst Kaltenbrunner）的猜想。卡纳里斯最亲密的一些帮手和亲信，如他的直接后任格奥尔格·汉森（Georg Hansen），也被处死了，因为他们都参与了1944年行刺希特勒的计划。阿勃韦尔的间谍头目（一局，Abteilung I）汉斯·皮肯布洛克（Hans Piekenbrock）和反间谍头目（三局，Abteilung III）弗朗茨·冯·本提芬尼（Franz von Bentivegni）都成了苏联人的俘虏。最终的结果是，阿勃韦尔的“身体”和“四肢”的绝大部分都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但其位于柏林的掌控一切的“大脑”却没有了。就反情报指挥中心的英美情报官员所知，阿勃韦尔总部的领导层已经不复存在了。

另一方面，纳粹安全部门的高级领导人已经大多被俘。帝国安全总部及其纳粹党内的前身——党卫军保安局（Sicherheits Dienst, SD）基本上从没发挥过处理外国间谍活动的职能。二战之前，他们的精力主要集中于在德国国内监视国民以维护纳粹对政治权力的控制，以及对那些出于种族和社会纯洁的需要应当受到迫害的人口成分（如犹太人、共济会会员和共产主义者）进行甄别。^①在希特勒的眼皮底下，阿勃韦尔和帝国安全总部达成了一个协议：前者只负责国外的军事和经济情报，而后者（内部的六局，Amt VI，即识别部门）只负责收集国外的政治情报。

对于阿勃韦尔的中层官员（也就是德国和欧洲各个分支办公室的部门负责人）来说，他们有切实的理由少说为妙。苏联已经将东部的三分之一德国置于自己的监管之下，其秘密情报部门，内务人民委员部

^① 对党卫军保安局和帝国安全总部的全面描述和评价，参见美军对威廉·霍特尔特博士（Dr. Wilhelm Höttl）的审讯报告，第61页（9 Jul. 1945, NARA, RG65, IWG Box 61, 65-47826-252-34）。霍特尔特是帝国安全总部的一名高官，一开始在三局，后来在四局工作。

(NKVD)和格鲁乌(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部,GRU)正在搜寻之前的对手。任何曾在阿勃韦尔握有职权的官员,如果暗示出自己对情况了解的真实程度,都会面临被氯仿麻翻后掠到苏占区的危险。美国 and 英国方面一直收到关于绑架案的报告,他们肯定已经意识到这只是冰山一角而已。^①

许多被俘的德国情报官员看得比眼前的灾难更远。很明显,德国的下一个主要对手将是苏联。正是预见到了这一点,德军在东欧的情报部门东线敌情署(Fremde Heere Ost)在自行解散后,将其记录转移到了洞穴里,而其工作人员则隐藏起来等待着有一天英美两国明白过来,他们打败了一个敌人,却只是为了要面对另一个。^②

此时还有一个担心就是,已经透露给英美的信息可能会传回到苏联人那里。战争期间,一次反情报的杰作使得阿勃韦尔发现并铲除了一个受苏联控制的间谍集团,他们已经渗透进德军和外交部门的高层。这些被称为“红色管弦乐团”(Red Orchestra)的间谍主要是有着良好家世的德国理想主义者们。那些知道“红色管弦乐团”的阿勃韦尔的高级官员们,应该会顺理成章地推测出,苏联已经在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中培养了一批有着相似情怀的个人。正如日后的事件所证实的,这种担心并非没有根据。

他们也担心可能受到战争罪的指控。盟军已经大肆宣扬要将二战的罪人们送交法庭。美国人所大力支持的纽伦堡战争罪审判(Nuremberg War Crime Trials)提出了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应对以他们的名义做出的暴行负责的观点。严刑拷打并处决囚犯,对犹太人实施灭绝政策——这些都是反人道的罪行,仅仅声称某人是在“服从命令”或其所做的事情只是在遵照“领袖的指令”,都是不正当的、不可接受的辩护之词。麻烦之处在于,即使那些被严格命令要打一场公平战争的阿勃韦尔官员也无

① 关于1947年苏联人对伯恩哈迪上校(Col. Bernhardt)实施的绑架,以及对威廉·库巴特(Wilhelm Kuebart)未遂的绑架(两人都是前东线敌情署的官员),在以下文件中有所记载:CIC Special Agent Charles Hayes to HQ, 970th CIC Det., 7 May 1947, NARA, RG319, Box 472, IRR000391.

② Richard Gehlen, *The Gehlen Memoirs*, London: Collins, 1972, passim.